党史上的三中全会

□李庆刚

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备受瞩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之际，正确认识党史上的三中全会，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中全会。自1921年党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举行了11次，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了4次。党的一大至五大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应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除因“文革”而未能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外，其余三中全会均按期召开。

改革开放之前召开的4次三中全会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6日至9日）、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全党的统治；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等文件，力图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正式复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中全会。伴随党的各项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并得到严格贯彻执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已如期召开了10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自此，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从计划价格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至30日）承担起探路任务。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等。

经过治理整顿，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据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部署。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保持农业农村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总结农村改革20年的成就和经验也很有必要。因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方针。

进入21世纪，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但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实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规划和部署，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之三农问题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再次聚焦农村改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等，为推进科学发展夯实基础。

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新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再次聚焦改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新时代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存在不适应的状况。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2018年2月26日至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旨在通过机构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2022年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在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完成人事安排和推进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年7月15日至18日）隆重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次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意义非凡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的特点。如上所述，党史上的14次三中全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0次三中全会，一棒接一棒，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节点。虽然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以及作出的重大决策各不相同，但个性中包含有共性。三中全会往往体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是在人事安排和机构改革后，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誓师大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可以说，“改革（开放）”“制度”“经济（发展）”，是其共同的关键词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何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唯有改革。二十届三中全会乘势而上，聚焦改革，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历次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越来越重。改革越是不断深化，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就越多，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就越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就越强，相应的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就越重。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这一主线，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继承、发展和运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的历次三中全会皆围绕经济发展做改革文章。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系列重大改革决策都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邓小平如何抓军纪

□顾　俊

加强纪律建设，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邓小平从1929年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到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为创建发展新型人民军队、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漫长军事生涯中，注重抓军纪是一个鲜明的特点，他在纪律建设上的真知灼见和坚定执着，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军纪体现军队的性质，事关部队形象，直接影响着战斗力。邓小平认为纪律是人民军队赢得群众、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他特别重视军队纪律建设，总是能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为了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树立良好形象，他教育部队指战员，“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一定要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老百姓亲如家人”。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先后任一二九师政委和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代理北方局书记，和刘伯承一起统率部队转战太行山、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邓小平针对军纪、党纪松懈的问题，明确要求“必须严肃党的、军的纪律，教育同志，克服松懈、散漫、调不动的现象”。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与刘伯承密切配合，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6年8月，邓小平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部队调防任务紧急，大约有百分之三的人忽视纪律。他迅速召开会议，部署在所有的部队里开展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要做到3条：一是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应对百分之三破坏纪律的分子发动群众性的检查，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二是各级首长负起责任来，决不能纵容；三是把纪律执行起来。为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1947年8月，邓小平在以中原局名义起草给所属部队的指示中提出，“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敢字当头，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而军队的整顿则是一项重点。他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启发大家：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要加紧纪律教育

遵纪守纪，既靠外部约束，更靠自律自觉。知纪才能守纪，纪律建设不能搞不教而诛。邓小平不仅自己尊崇纪律，还一以贯之地倡导纪律教育，希望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让干部战士知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1938年1月，邓小平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在随后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总是告诫大家，“要加强干部和政治工作，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和说服教育，正确执行纪律”。

1949年4月底，针对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暴露的纪律问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建议中央军委推迟攻占上海，以便部队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训，对干部战士进行一次入城政策纪律教育。邓小平在丹阳听说有些领导干部不严格管理部队，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陈毅、粟裕等人分头行动，在不同场合响鼓重锤，带领大家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保证了部队入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以胜利之师在蒙蒙细雨中不进民宅而露宿街头的良好形象，在上海市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针对军队过去一段时期的混乱，指出“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同韦国清等谈话时提醒，讲纪律，更要讲在自觉的基础上执行纪律，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这样才能加强组织纪律性。

命令是要执行的，指挥是要服从的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邓小平深知，让禁令生威，就要精准执纪、严格执纪，确保纪律执行到位。1947年5月，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致电晋冀鲁豫各军区、各纵队并报中共中央，通报晋察冀军区某部队模范执行纪律情况。他们赞扬道：“该部队此次来太行地区作战，群众纪律很好，对地方政权和军队均异常爱护。”“此种团结友爱的精神和模范的纪律，应为我全区部队学习、发扬。”

纪律的权威性来源于执纪的严肃性。邓小平一向主张言而有信、执纪如山，对违反军纪的行为绝不姑息，目的是惩戒于已然、防患于未然。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困难重重，部分队伍出现纪律滑坡的现象。邓小平等领导与各部队“约法三章”，规定对抢掠民财等行为予以严惩。不久，野司警卫团一位副连长私自拿了一个店铺的一捆花布、一捆粉条，触犯了禁令。由于这个副连长平时表现不错，许多人请求宽恕他，当地群众也前来为他求情。邓小平不为所动，秉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从严惩处，使军纪得到了有效整肃，为部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8年，为保证全党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并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制度都作了详细规定。1948年9月，邓小平针对中原区存在的各地各部队自出布告、自定政策，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或报告不真实等现象，致电刘伯承陈毅等，提出中原区加强纪律性等问题的明确意见，有力促进了中央决定的贯彻。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振聋发聩地发问：“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这一发问对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纪律严明优良传统的坚定意志和急切态度溢于言表。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纪律建设是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邓小平从严治军的思考与实践，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

革命摇篮　薪火相传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碑文敬读

□祝　彦　宋　锋

江西是一片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红土地，有着“四大摇篮”的美誉，即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据不完全统计，江西为国捐躯的在册革命烈士达25万余人，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坐落在英雄城南昌八一大道中段东侧，占地1.7万余平方米，是国务院命名的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在纪念堂前的广场中心有一座雄伟的红军战士塑像，塑像如同一座丰碑彰显着先烈们的英雄事迹和崇高品质。塑像基座刻着几行碑文，碑文是1954年7月由江西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全文如下：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人民革命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光荣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革命烈士们的不朽英名，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心里！

全省人民誓以坚强的决心，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江西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决议

70年前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形式呈现的碑文，高度赞颂了革命先烈们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表达了江西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建设伟大祖国的坚定决心。碑文虽短，承载的却是后人对革命先烈们无限的敬意和绵长的追思。



工人运动的摇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安源成为重点工作区。在党的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1921年秋天，参加完党的一大的毛泽东回到湖南不久，就兼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9月上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并于当年9月14日成功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付出代价最小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典范。正当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1925年9月路矿当局勾结军阀，用武力制造了“九月惨案”，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9月21日晚，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的黄静源，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离不幸被捕。黄静源在军阀多次残酷刑讯下仍坚贞不屈，于1925年10月16日被敌人杀害。安源留下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足迹，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人民军队的摇篮。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疯狂屠杀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武装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起义军成功占领南昌城。8月3日起，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其后起义军转战多地，在潮汕地区遭遇挫折后分散转移。南昌起义参加者2万多人，至今知道姓名的仅1178人，在一系列战斗中，陈守礼、吴国扬、张堂坤、蔡晴川、冷相佑等同志英勇牺牲。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至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以及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共有大约4.8万名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著名的烈士有卢德铭、王尔琢、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伍若兰等。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23岁。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共和国的摇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建立新型政权的有益尝试。这次伟大尝试，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瑞金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摇篮。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事业中，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何叔衡、方志敏、黄公略、刘伯坚、毛泽覃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